

新世纪抗日文艺向何处去

在民族苦难面前的任何娱乐化历史书写，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张丽军

前段时间，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两段关于战争的视频，心中感慨万千，乃至在有的镜头前不自觉流下泪来。一段是关于抗战远征军的故事，一位女记者去寻找那些被历史所遮蔽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在缅甸，一些老兵激动无比地握着记者的手，说：“老家来了，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记者心中说，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是，老兵视之为魂牵梦绕的亲人，视之为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另一段是关于朝鲜战争的视频。一群寻找亲人遗骨的中国人踏上了朝鲜国土。在亲人战斗过的山峰、河畔、草地边，捡拾遗落的骨骸，尤其是在荒草萋萋的无名墓地，伏下身来拔掉那些荒草，献上祭品跪拜，说：“每一个无名墓地，埋的都是祖国战士，都是亲人，弟弟可能就埋在这里。今天，姐姐来给你扫墓了，带着爸爸、妈妈的灵魂来看你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你。”毫无疑问，战争的硝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对战争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这些视频在提醒我们：如何对待过去，如何书写战争，如何对待那些逝去的灵魂，依然需要我们今天做出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在中日关系处于新的对峙状态下，这尤其显得重要、峻切而别具现实意义。

文学书写不能缺位

新世纪以来，我们有了一些较好的战争文艺作品。在影视剧方面影响最大、最受欢迎、艺术水平最精湛的抗日电视剧，自然非《亮剑》莫属。这是一部正面书写八路军抗日历史的影视作品，在思想立意、叙述架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八路军独立团团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既是互相敬佩、精诚合作抗日的朋友，又是以死力拼、努力消灭对方的敌手，可谓棋逢对手。即使对侵略者，《亮剑》也客观展现了日军的训练有素和顽强机智。这无疑是很大的突破，是对历史真实的最大限度接近，也是该剧成功的一个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亮剑》对李云龙形象的塑造，是该剧最大亮点。李云龙的桀骜不驯、话语粗俗、勤于思考、血性义气的个性在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之后，一些跟风之作，如《狼毒花》，只学了个皮毛，自然难以企及。电影《南京！南京！》是一部较好的影片，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抵抗的南京、民间的南京。《金陵十三钗》较精彩地描写



卢鹏画

了十三个妓女的悲惨抗日故事，但在妓女替代女学生赴死的立意上是令人质疑的。时下非常流行的“抗日神剧”，则更让人忧虑不已。

尽管新世纪抗日影视剧存在着一些不足，但那种直面历史、还原历史和书写历史的精神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在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战争悲剧书写。与影视剧形成截然对比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民族沉重主题的叙述与书写是缺位的，很多作家采取的是回避姿态，或视而不见，或根本就无心、无力、无历史责任感地去书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对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是责无旁贷。这不仅关乎一个民族最沉痛历史的记忆书写问题，而且是关乎当代中国和未来命运的事情。

还原被遮蔽的个体经验史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文学书写在新历史主义、地域文化和人性深度等方面展开了新的叙述。从新时期莫言的《红高粱》开始，抗战文学叙述出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潮。即从原来统一的、单线的大历史，转为多元的、复线的小历史，重视大历史维度下的个体史，充分挖掘历史档案、家族史、日记、口述史等多样化历史资料，力图还原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个体经验史。《红高粱》从“我爷爷我奶奶”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来叙述以往被大历史观

所遮蔽的民间抗日战争史。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新世纪以来一些山东作家对抗战历史展开了新的叙述，其中以牛余和、常芳、季桂起等影响较大。

牛余和的小说《蘸火》讲述了章丘大山深处的八路军、国民军和“匪军”等三支武装犬牙交错的抗日故事。抗日侦察队长郭立刚英勇无比，手毙汉奸，但不幸中枪，被“侠女”夏侯雪所救。飞镖、毒药、利刃、快枪、“毒药丸”，夏侯雪不仅利用传统战法杀死敌人，而且武艺高强、美貌无比，她与“儒匪”梁铁峰的爱是“惊险的传奇经历”。梁本是燕京大学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有着一腔热血，放弃心爱的专业投身抗日事业。这些武侠元素和传奇色彩为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增添了艺术魅力。可贵的是，《蘸火》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作者把地域人文气息与革命英雄历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山东章丘素有“铁匠之乡”的美誉。在抗战时期，活跃于民间的章丘铁匠，因为有着特殊的冶炼钢铁的能力和技巧而被缺少枪支弹药的国共地方部队吸收为职业军工。显然，牛余和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叙述切入点，一下子就把坠入历史尘埃的革命往事与章丘自古传承至今的地域人文历史结合起来，演绎出了一幕幕鲜活的、打动心灵的英雄戏剧。

常芳《桃花流水》中出现的百花洲基督教堂、将军庙天主教堂、曲水亭棋社、贵心斋的果子，无不带有老济南的记忆。

小说不仅是书写一个自然和人文历史的空

间，而且还展现了济南空间所具有的“仁义”的文化特性，昭示出济南空间的“精神结构的特殊性”。为了从日本人的监狱中赎出好朋友，何启明宁可答应出任伪县长，不惜牺牲个人名声、气节，来避免日本人讨好朋友和师生的杀戮；而且至死也不告诉朋友，只是在临别前以“水壶”相赠明志。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老一代人至死无法原谅日寇的背景里，孙辈却开始了以日语为业的新生活。如何反思历史以及民族间曾有过的恶，是常芳提出的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2013年，季桂起长篇小说《长河谣》出版。小说以德州抗战历史为背景，以石桥镇张姓两代人的抗战为主线，全景再现了德州儿女为抗日战争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作品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入手，马颊河两岸平静的乡村生活被战争打破，石桥镇张弘镇的几个儿女相继参加了抗战队伍。石桥镇张、赵、李、刘四大家族在张弘镇的带领下控制维持会，与汉奸斗智斗勇，假借听从日军，暗中支持游击队。抗战叙述中穿插了浓浓的亲情、淳朴的爱情和有人情味的德州民间文化，给人温暖和滋养。

山东作家的“新叙述”

常芳2014年在《中国作家》发表的长篇抗日文学《第五战区》则开始一种新的历史叙述。以南沂蒙县为叙述背景，主要描写了鹿、梅两大家族的命运，从而展现了抗日战争中民众真实复杂的文化心态和血性气质。在穆陵关战役和莒县保卫战间隙，一支参战的地方武装，竟然打起了夜袭日军的想法，说：“只要咱们不绝种，就算是像移山的愚公那样，子子孙孙跟他们打，早晚也得把他们打回去。”小说的叙述笔致闪现着萧红《生死场》的影子，表现了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农民在血与火的磨砺中觉醒成长。这无疑是新世纪中国作家对大历史题材进行审美书写的新尝试。

事实上，新世纪抗战文艺向何处去是一个极为峻切而又严肃的问题。在民族沉重苦难面前的任何娱乐化历史书写，都是很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新世纪抗战文艺无论是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多元化书写，还是展现战后问题的视频镜头，都应该是建立在祛除遮蔽、还原历史、健全人性、捍卫和平的精神维度之上。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有苦难的战争，就有伟大的战争文学。我们期待展现伟大人性光芒的伟大抗战文学。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协特邀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课题多项，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多部，多次获山东社科奖、泰山文艺奖、刘骥文艺奖等。）



□薄克国 范岩 报道
8月12日，“清源2014”青岛行动——文化市场联动执法应急演练在平度市举行。演练现场，执法人员查处了违法违规活动，化解了各种干扰阻挠执法的行为。



□冯志强 报道
日前，为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举办了以“文明小区你我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居民的阵阵掌声和笑声。



□新华社发
8月11日，观众在中国科技馆博物馆内参观。当日，位于南京的中国科技馆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为观众讲述中国古代的科普历史和科普文化。

齐鲁名家创作书画支援灾区

□吕季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支援山东鲁甸地震灾区，日前，由省社科联和省文联牵头组织的“山东省向太阳书画特展系列活动组委会”，联合山东省红十字会、山东画院、齐鲁文化会馆、将军书画院、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山东中山书画院等单位，组织了“万众一心——齐鲁艺术名家支援山东鲁甸地震灾区书画笔会”大型赈灾公益文化活动。36位齐鲁书画名家参加活动，共创作了48幅书画精品，并现场全部捐赠给山东省红十字会。

全国古籍修复人才

济南开班培训

古籍修复“数量多而人才匮乏”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2日，第5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提高班在山东省图书馆开班。此次培训班采取基础理论与技术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员既了解古籍修复相关的背景知识及必备的专业知识，又在国内顶级专家的指导下实际操作，大大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
此次参加培训的近30位学员，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全国古籍收藏单位曾参加过古籍修复初级培训班的学员中考核招收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中，来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相关人员讲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有关工作，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周崇润主讲《古籍防虫杀虫技术、保护环境》，对中国传统古籍修复和字画装裱有着深入研究的杜伟生主讲《书画装裱基础》、《手卷》等内容，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潘美婕主讲《古籍修复》等内容。
但在目前的修复界，亟待修复的古籍数量多，而人才极为匮乏。此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山东举办修复技术提高班，为促进山东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作为全国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山东省图书馆现有古籍75万册，有30万册古籍需装订，有40万册需修复，有15万册包括2万册馆藏珍品需重点修复。而古籍修复人员不到10人，古籍修复工作任重而道远。

冠县消夏晚会群众唱主角

□王学广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再说咱农民，梦想又成真，种地不缴粮，还给补贴金，您说咱农民称心不称心？”“称心，称心。”……一段问答式的演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近2000名听众在听戏的同时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与表演者一起哼唱起来。7月25日晚，在冠县第十五届消夏艺术节豫剧票友大赛的舞台上，梁堂乡中老年文艺协会豫剧演员郭凤环的一段《梦想成真》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给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今年，冠县创新思维，改变往年简单邀请外地小有名气的演员前来演出的模式，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文化惠民为主题，陆续举办10余场由冠县人自己演唱的京剧、豫剧票友大赛和青年歌手大赛。此次艺术节共吸引全县140余名戏曲爱好者前来参赛，为市民送上了一道消暑文化大餐。

思乡之念和家国情怀成为山东作家写作的特质

气韵雄浑的“齐鲁乡愁美学”

马兵

1942年夏，17岁的少年王鼎钧离开兰陵古邑，去后方投学从军，至此飘零一生，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然而这位后来以散文名世的文学巨匠，却将他最好的文字尽数托付给故乡，忠贞地守护着他作为齐鲁之子的拳拳乡情。在名篇《水心》中，他写道：“昨夜，我呼唤着故乡的名字，像呼唤一个失踪的孩子：你在哪里？故乡啊，使我刻骨铭心的故乡是我捶胸顿足的故乡啊！故乡，我要跪下去亲吻的圣地，我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雕琢过的艺术品，我是我对大地的初恋，注定了终身要为你魂牵梦绕。”王鼎钧这段独白道出的思乡之念和家国情怀成为山东作家写作的特质。

以乡土本色为文坛瞩目

对“原乡”的回返与追寻，是文学重要的向度之一，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山东文学而言，这一文学类型更是获得了丰富多维的审美观照。无论厮守故土还是羁旅异乡，那孕育于这方水土里的文化基因终将山东作家的创作陷入一种气韵格外雄浑的“齐鲁乡愁美学”之中。现代时期的鲁籍作家杨振生、王统照、李广田、臧克家等均以乡土本色为文坛瞩目，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乡土书写往往内蕴着细腻的生命体验和人间情味，让其家园之思突破一己的悲欢牵挂而回荡着大地的回响。李广田那首脍炙人口的《地之子》无疑即是明证：“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作为儿子的深情，/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湿软软的，/我的襁褓；/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野草，/保姆的怀抱，/我愿安息在这土地上，/在这人类的田野里生长，/生长又死亡。”这里，从生到死，生命所有的根根

须须都与大地有着相同的脉动；这里，情感沉潜平静而又坚实丰饶；这里，是念兹在兹的故土，更是正德厚生的大地。

掂拾散落大地之灵的精魂

进入当代时期以后，山东作家继续秉持“地之子”的本色，抒发对大地与生命的感怀，以扎实的创作延续着前辈所开拓的脉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以王润滋、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烨园、矫健、左建明、赵德发、李贯通、刘玉堂、张大春等为代表的鲁籍作家，开陈出新，或努力追觅潜藏在大地深处的诗性，或将文化守成精神与大地意识紧密结合，或在齐鲁山水间掂拾散落大地之灵的精魂，或以奇崛瑰丽的隐喻，歌颂大地之间充塞的浩荡的母性的力量，彰显出风韵独特的大地根性。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从极为阔大的自然伦理的角度为大地“复魅”的首倡者。张炜是“融入野地”这个词的开拓者。从《古船》、《九月寓言》、《怀念黑潭中的黑鱼》、《柏慧》到新世纪里的《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刺猬歌》和《你在高原》，张炜“绿色的遥思”越来越澄明地指向大地。在1993年发表《融入野地》时，他说：“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因为我单凭直觉就知道，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于是《九月寓言》中，我们读到了他“作为一个大地之子的幻想和浪漫”。而十年之后，当他再次重申：“人直接就是自然的稚童，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也只是个稚童而已。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稍有觉

者，就会对大自然产生一些莫名的敬畏”时，这个“大地之子”多年在龙口海滨万松浦“融入野地”的生活，已让他溢出“幻想和浪漫”，在充分“返魅”的自然里获得了真正诗意的栖居。如果说，在《九月寓言》里呈现的生态观更多是一种“民间”真气淋漓的智慧，而到了新世纪的小说中，他真的已把自己化为大自然的“一个器官”，也让他当年憧憬的“生命的跳跃”落实在了纸面和大地之上。

醇正温静的乡土之美

新世纪以来，山东文坛青年人才辈出，对乡土的观照依然构成他们写作的重要向度。张继、刘玉栋、王方晨、王月鹏、柏祥伟等都有影响不小的乡土题材作品，也都显现出他们作为新一代的齐鲁“地之子”，在面对当下乡土时的启蒙与眷怀、质疑与留恋、疏离与回返、审视与依偎等诸多复杂交缠的意绪。

比如刘玉栋，在写作之初，他的城市题材的小说有着咄咄逼人的先锋的芒刺，之后，他把目光拉回到乡土，那些从童年记忆深处掂拾出来的点滴为他封存已久的乡土经验打开了一个缺口。刘玉栋的乡土小说多用儿童叙事，用天真去体会繁缛的世事，在保持孩童明快懵懂叙述口吻的同时，又隐含着疼痛，而正是这种疼痛让他这类小说在人们称颂的诗性之外葆有着悲悯的底色。在《给马兰姑姑押车》中，九岁的红兵被选中去做押车的孩子后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幸福感里，以至激动得难以入眠，可临到押车的那天，红兵却因倦倦在车上睡着了。所有为了押车而做的精心准备都白费了。醒来的红兵隐隐地感觉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是都那么令人高兴”。小说在描写乡村淳朴的民俗中信笔去写一个孩子的心痛，洋溢着温润的乡愁，也连带出一代人共有的童

稚记忆。刘玉栋很擅长刻画乡村的老人，《火化》里的连根爷爷对火化政策充满不解，不能入土为安的恐惧酿成了他的自杀之举，小说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的却是守土者眷顾土地的赤子之爱。而《芝麻开门》中的奶奶在祖屋被迫典卖的当口溘然长逝，魂守故里。他们对于土地、房屋和家园近乎迂腐的留恋恰显现出“地之子”的人性的执拗与朴质。

当然，新世纪的乡土在城市化、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之下，已经出现了“本质性的转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定义的“乡土本色”逐渐被“虚土”、“无土”的经验替代，这也给乡土写作和原乡抒怀提出了新的课题。刘玉栋的《芝麻开门》、《乡村夜》、《火色马》、《早春图》、《给你说说话》等小说在小人物命运的变迁中来辐射醇正温静的乡土之美、乡土道德的式微，以及乡土氛围正在消逝的现实。王方晨的《榆树灵》、《生命是一只香油瓶》、《美丽芬芳》等把着力点放在基层的权力变异带来的乡土伦理生态的异变，对现实丑恶的鞭策犀利入骨。这同样体现了他们作为齐鲁“地之子”的忧患和担当。

回到开头，王鼎钧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之一《昨天的云》中提到，1943年，他在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读流亡中学，教地理的先讲完最后一课，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已经读完本国地理，你们对整个中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你们最喜欢哪座山哪条河？你们最喜欢哪一省哪一县？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王鼎钧当时的回答是“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这是齐鲁大地之子的抉择，是齐鲁大地的子民对故土淳朴的感恩，也是齐鲁大地对她的子民永远的召唤！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研究和新世纪文学热点研究。）